

# 安葬故土



## 回忆录：失踪的飞行员

Merrill Joan Gerber

近30万名美国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国捐躯，战争结束后60年仍有7.8万人下落不明，但美国军方仍在积极寻找所有阵亡和失踪将士，辨认、发掘和运回他们的遗骨。每一名这样的战士告别他们的家人和心爱的人。多年来，几十年来，等待他们归来的人始终怀有一线希望，从未肯定他们送别的亲人究竟发生了什么。本文是一篇关于一个家庭的悲痛的个人叙述以及军方如何在多年后努力找到失踪的飞行员并将其安葬在祖国土地上。

Photo courtesy of Merrill Joan Gerber

**1** 1943年2月6日，我的表兄亨利·舍曼 (Henry Sherman) 我所见到的最完美的士兵——在一个叫新几内亚 (New Guinea) 的地方的上空消失得无影无踪。自从他教我唱陆军航空兵团<sup>1</sup> (Army Air Corps) 团歌那天起，我就对这消息有所准备。

*我们在盛名中生活，在火焰中坠落，*

*陆军航空兵团攻无不克。*

在这之前，他从航校给我们家写信时，我就开始担心。我母亲念给我们听的一封信尤其让我忧心忡忡：

亲爱的家人：

昨天像天使般上天了。情况越来越严峻。

我真的在学怎样在空中旋转飞行那架飞机。我最喜欢头朝下地飞。

因为我有父亲多次把我头朝下地举起的经历，我清楚亨利会头晕，没法把握他的飞机的方向。

亨利从航校毕业后，利用他

<sup>1</sup> 陆军航空兵团：1926年至1941年间美国陆军航空兵的名称。译注

上图：作者的表兄亨利·舍曼于1943年失踪前几个月与4岁时的作者的合影。这是在她纽约市布鲁克林家门口前拍摄的。

版权所有©1998年。

最后一次休假探亲回家。我的祖母告诉他，他走那么远让她感到担心，说罢就哭了起来。亨利从口袋里拿出一块银元，把它抛起。“奶奶，我的好运银元，”他说。“落地的时候，正面总是朝上。瞧，我把我名字刻在上面了。会平安无事的。”

他让我摸了摸银元，然后把我举在他肩上，这时我父亲给我们照了相。他军帽前部的金色飞行员翼状帽徽在阳光下熠熠闪光，让我感到既兴奋又愉快。只要亨利在，生活就令人激动。他的帽檐挺刮，衬衫领尖笔直，袖子从肩膀到手腕有一条漂亮的折子。他气质完美，而我父亲却因为我，因为有妻子和一个孩子，而没能参战。他总是穿着肥大的裤子，衬衫从裤腰拽出。他的卷发散乱，难以梳理，有时还忘了刮胡子。因为他开了家古董店，成天跟陈旧家具和灰尘覆盖的塑像打交道，所以手指甲始终满是污垢。

有时我真希望比我整大20岁的亨利（我们的生日都是3月15日）能是我的父亲。他知道需要什么。他答应我无论他降落在世界上哪个地方、哪个基地、哪个遥远的城市，都给我寄礼物。“无论去哪儿，我都会想你，”他对我说，使劲用他那漂亮的嘴唇亲我的面颊。“我会给你寄玩具娃娃和扇子，还有小铃铛和有着绚丽多彩尾巴

的雕刻孔雀。”

我那时4岁，快5岁了，我特别喜爱他。我们的母亲是姐妹。他的母亲伊娃（Eva）比我母亲大12岁，而且是同母异父。她个头很高，长相美丽。她穿带花边和钩子的漂亮紧身白胸衣，如果愿意，她就会毫不犹豫地当着我面脱掉衣服，让我看她那胴体、她那系拉长袜的系袜带，和她那丰满光滑的乳房。我母亲瘦小内向。她穿衣时，整个脸和半个身子都在壁橱里，只让我看见她裸背的曲线。有时她甚至把睡袍拿进浴室去穿。

我的另外一个姨妈格雷塔（Greta）比我母亲晚出生两年，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她和我母亲、父亲、祖母和我一起住在布鲁克林（Brooklyn）的房子里，因为她别无选择，也无处可去。

伊娃姨妈不住在布鲁克林，而住在布朗克斯（Bronx），不是住在一幢有后院和前院的房子里，而是住在一座有大理石门厅和电梯的公寓高楼内。她的丈夫，即我的姨父艾迪（Eddie）曾经是个职业拳击手。虽然他矮小和非常粗壮，甚至有个断骨的鼻子，却没有吓着我。除亨利外，他们还有两个儿子，即欧文（Irving）和弗雷迪（Freddy），一个比亨利大，另一个比亨利小。他们仨兄弟都很帅。和他们在一起特开心。我为和他

们有血缘关系感到自豪。

战争对一个20世纪40年代生活在布鲁克林的孩子而言意味着若干特定的事：你不得打断新闻广播，尤其是你父亲朝无线电前倾着头，举手制止你说话的时候；鼓励你把口香糖和街上捡到的烟盒包装用银锡纸团成球；敦促你放弃你珠宝盒里所有的人造珠宝饰物或珠子项链。锡纸球会以某种方式帮助我们的小伙子们打赢这场战争，而珠子项链可跟新几内亚的野人换食物，万一我们的小伙子在山里迫降，需要跟原住民以物易物。所有儿童都被敦促购买战时印花税票贴在小本子上。等税票贴满后就能买张战时公债。这也有助于打赢战争。

为了让亨利平安回家和我们团圆，打赢战争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打仗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灯火管制的警报拉响时拉上黑窗帘。不要新皮鞋、不吃羊排、不用糖做蛋糕意味着能有更多的东西给我们的小伙子们。一切就这么简单。如果我们这么做了，希特勒就会灭亡。

亨利失踪后，我的家人等待着消息，等待除了电报之外的任何消息。事实是亨利失踪的消息已经很糟糕，但是我的每一个亲人和我们寓所里的每一个人都肯定他还活着，这是件好事。整个



Photo courtesy of Merrill Joan Gerber



Photo courtesy of Merrill Joan Gerber

1944年4月拍摄的两张照片。左侧的是亨利的父母爱德和伊娃，右侧的是作者的两个姨妈格雷塔和伊娃。

邻里的人都怕见到骑自行车送电报的男孩，因为他们掌握着递送最坏消息的权力：某某人的儿子阵亡，永远回不了家了。

儿子阵亡的母亲得到贴在窗上的金星，就像我在幼儿园能辨认数字或颜色或能准确说出教室里的钟的时间时受到奖励获得的金星一样。我的伊娃姨妈出于两个原因没有得到金星：其一是尚未证实亨利已经阵亡，而只是“作战中失踪”；其二（我这么推想）是她没有能贴金星的朝街窗户。我私下琢磨，倘若送电报的男孩带来最坏的消息，她是否可能搬进一栋单层房子（最好在我

们附近的布鲁克林）来展示金星。

失去男孩对我的家庭而言已经不是新鲜事。我已经失去了一个舅舅——我母亲的哥哥山姆(Sam)。我的祖母肯定他还活着。如今她的女儿也有一个不知下落的儿子。我想像有一天我也得有个失踪的儿子。这不是我所期待的，虽然我承认这会引来人们大量的关注、探访者和电话，并让你进自己的房间去哭一鼻子，因为你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哭过不少。

我的祖母早在我出生前，从失去她的儿子到现在，一直坚持每天晚上让前廊的灯开着，因为

她期待山姆会走进门来。她曾让算命的算过他在哪儿。她参加过降神会。家里其他人都认为山姆是淹死了。他和朋友们在赎罪日晚上，而且又是在暴风雨中钓鱼——那是个非常不恰当的时候，因为就像我的姨妈格雷塔对我解释的那样，那天晚上所有犹太人必须为赎罪开始24小时的斋戒。山姆本该在犹太会堂向上帝祈祷。

我能理解钓鱼的诱惑。我父亲经常带着我，坐在普雷斯佩克特公园(Prospect Park)的划艇上或在希普斯黑德湾(Sheepshead Bay)的一个突码头钓鱼，可我们从来没有在晚上去过。晚上钓鱼有什么

意义呢？我们怎能看到水上荡漾的阳光、鱼线上银色光泽的鱼的跳动、鱼在木船底或在码头上竭力挣扎着拍动它的鳍、鱼在大口吸气时鳃的起伏，以及鱼最终放弃斗争后片片鱼鳞逐渐静止不动呢？

我母亲告诉我，她的哥哥在那个暴风雨的赎罪日夜晚消失后，她虽然只有17岁，却被多次叫到停尸所去看溺水者的脸，因为没准其中一个就是山姆。没法要求我的祖母这样做，也不能如此要求格雷塔姨妈。我哀求我母亲形容死人是什么模样，可她不说，但是她明确地告诉我，即使死者之一是山姆，从而可以获得1000美元的保险金以付清房子的按揭的话，她也宁肯不要这笔钱，而她感到高兴的是结果没有一个是山姆。

我的祖母仍然认为山姆会阔步走进门来，我的姨妈伊娃则肯定亨利会徒步走出新几内亚的大山，从某个地方给她来电话，而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父亲的家庭没有失踪过一个儿子，也不期待他们的鬼魂会出现在门口。他不时地威胁说要入伍打仗，因为他觉得不“身历其境”的话他就是个废物，可是我的母亲和我央求他记住我们在这儿多么需要他。

亨利失踪后的几个星期，我

的姨妈伊娃跟她的男孩弗雷迪和欧文——其实他们俩已是成年男子——许多周五的夜晚都过来，分享我祖母做的煮鸡和肉包汤。（周五晚上艾迪舅舅依旧和他的老朋友玩扑克牌，但伊娃姨妈说亨利失踪后他精神崩溃了，再也不会跟以前一样了。）晚饭后，我们一开始聊天，伊娃姨妈就从皮包里拿出亨利的指挥官写的信，再次读给我们听，以证明仍旧有希望。

亲爱的舍曼太太：

给你写这封信多么令我痛苦，这是我一生中最高心的职责。你的儿子是个优秀的年轻人、我的一位好友。我知道他对你的挚爱……我现在能做的一切是告诉你我们所了解的在1943年2月6日发生的事。那天我们飞行到新几内亚的乌奥。一共6架。在乌奥机场上空，我们遭到约40架零式战斗机和一些轰炸机的攻击。亨利和R.H.施温森 (R. H. Schwensen) 中尉、埃里克森 (Erickson) 上尉、三等兵福恩 (Faun) 和三等兵皮耶库托夫斯基 (Piekutowski) 一起驾驶一架称作“提前送递” (Early Deliver) 的飞机。零式战斗机迅速逼近，有4架向亨利的飞机俯冲。他在转弯时飞近机场，之后的事情就没有人确切知道了。我们的战绩无助于你克服悲痛的心情，但日本鬼子损失了26架，而我们（我遗憾地说）损失了一架。在这

块有着数千里连绵丛林、山脉和只有上帝才知道是什么的地方，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可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是侦察，尽力找到他的飞机。只要我们在新几内亚，我们就会一直找。

写这样的信比打仗还困难。亨利是我的朋友和哥们儿。只要有办法找到他，我们就一定会找到他。这你可以放心。

第33部队运输机中队  
(33rd Troop Carrier Squadron) 上尉  
罗伯特·L.沃德 (Robert L. Ward) 谨上

伊娃姨妈通过国防部 (War Department) 成功地与施温森夫妇取得了联系，他们是亨利的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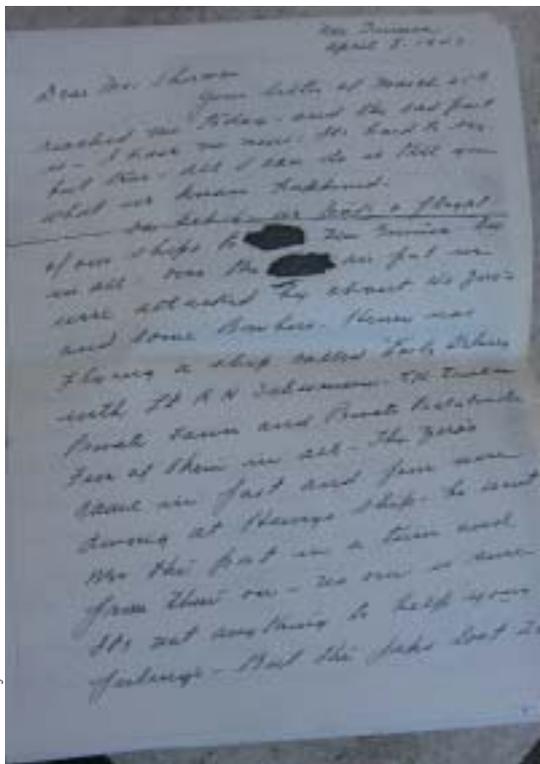


Photo courtesy of Merrill Joan Gerber

亨利·舍曼的指挥官罗伯特·沃德上尉写来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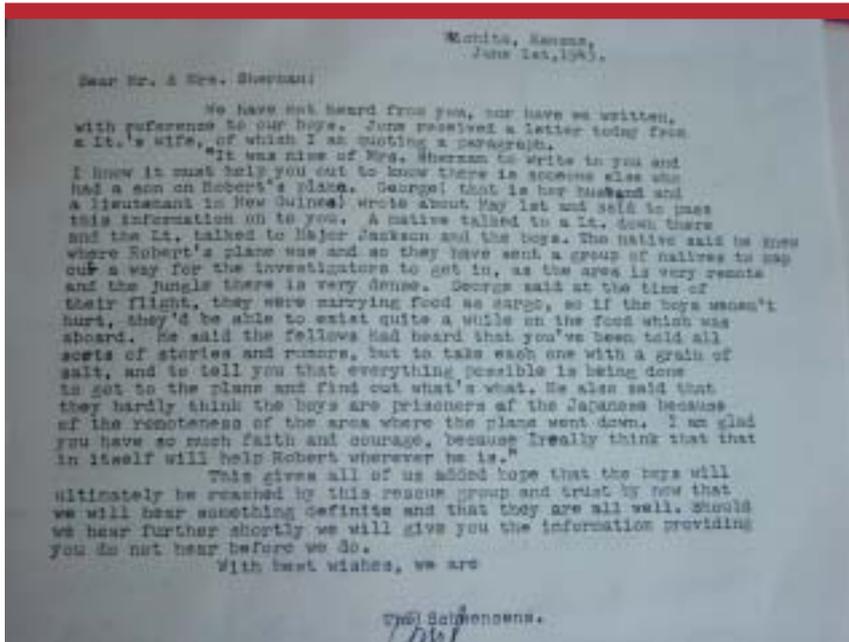


Photo courtesy of Merrill Joan Gerber

施温森夫妇于1943年6月1日写的信。

驾驶的父母，住在堪萨斯州的威奇托 (Wichita, Kansas)，就此两位母亲开始通信。伊娃姨母也把施温森太太的信念给我们听：

亲爱的舍曼先生和夫人：

除了我们还有另一位母亲，她也有个儿子……我知道让你们知道这个消息对你们会有帮助。她的丈夫是个在新几内亚的中尉。他跟那里的一名原住民谈过，那人说他知道罗伯特的飞机在哪儿，所以他们就派了一组原住民为调查人员进行搜索以找出一条路，因为那个地区非常远，那里的丛林又非常稠密。她的丈夫说他们那次飞行是运输食物，所以如果小伙子们皮肉无损的话，能靠飞机上的食物生存相当一段时间。他还说他们不认为小伙子们成了日本人的俘虏，因为飞机掉在很偏远的地方。我高兴的是你有这

么大的信心和勇气，因为我认为这本身就能帮助那些小伙子，无论他们在哪儿。这给我们所有人增加了这个营救小组定会找到他们的希望，我坚定地认为到（你收到此信）之前我们会得到些确切的消息，而且他们安然无恙。要是在短时间内听到了更多的消息，我们将转告给你，如果你没有先听到的话。

最美好的祝愿，施温森夫妇。

我的格雷塔姨妈妈说：“所以任何事还是有可能的。”

“什么事都有可能，”我母亲同意地说。“有办法找到他们的话，他们会找到的。”

虽然我根本没有把握，可我添了一句：“我知道他会回来的。”

就在这同一个晚上，我的表兄弗雷迪一本正经地对伊娃姨妈妈说他去市中心应募入伍了。“我打

算学习成为领航员。我告诉招募的人我要求被派到太平洋地区。我要打死那帮让我哥哥失踪的杂种。”

“啊，求求你！”伊娃姨母叫道。“别给我干这样的事。”

到弗雷迪已经随同第82空降师(82nd Airborne) 被派往欧洲战场的1943年8月，我的伊娃姨母又收到一封信：

亲爱的舍曼先生和太太：

现在已是上尉的吉米·坎贝尔 (Jimmie Campbell) 7月15日从新几内亚回家。他曾在南太平洋地区待过近15个月。2月6日罗伯特和亨利的运输机似乎被击落的那次飞行是他领导的。他来到我们家和我们聊了许久。他的确给小伙子们的生命安全描绘了一个非常暗淡的前景。当然，他也谈到政府关于他们失踪的观点，正如你已经知道的，政府对他们的生还不抱太大希望。然而，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小伙子们可能还活着，因为还没找到飞机。他详细解释了灾难性的那天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他说那天敌机出现时，他们全都认为要被击落。地面上我们的高射炮火和空中的战斗机打下了入侵的38架零式战斗机中的28架，但是有两架不知怎地突破了围，突然袭击我们的一架飞机，看来他们是牺牲者。

我们的大儿子眼下正在国内

接受飞机驾驶员训练。下面是我们从他的来信中为你摘引的一段话：“我反复思考罗伯特和我在圣安东尼奥 (San Antonio) 的对话，他说他万一面对严重形势时，知道该做什么……他说等其他所有人跳伞以后，他会用爆破器材毁掉飞机。这就是他们没找到他的飞机的原因。飞机上有他发誓要破坏的秘密雷达设备。他已经在脑海里排练了无数次，以至这一切已牢牢记在他心里。我就是知道他还在某个地方活着。”

所以你看我们还没有绝望，我们也不希望你们绝望。我们仍坚信和期望我们所有失踪的小伙子们都能安全归来。

最美好的祝愿，贝丝 (Bess)

和贾斯特斯 (Justus)·施温森谨上。

弗雷迪从比利时给我寄来一条刺绣丝衬衫和与其匹配的裙子，它的上身紧盘的带子高到腰间上方。他还送我一个我把她取名为爱丽丝 (Alice) 的瓷娃娃。我的格蕾塔姨妈用黑毛线为她做了一头头发。我可以把它编成辫子，虽然它不像我朋友的某些娃娃头上的金黄头发一样好。那种娃娃价格不菲，我的父母买不起。

格蕾塔姨妈参加了红十字会 (Red Cross)，多日待在犹太会堂，用纱布为在海外的小伙子们做绷带和织袜子。我经常跟她去，和其他妇女坐在长桌旁。送来散乱的锡纸时，把它们裹在越来越大的银球上的任务就交给我了。虽

然跟篮球一般大的银球很漂亮，可我不太明白它在战争努力中的目的。虽然犹太人不该吃火腿，可我母亲开始把火腿煎出来的油脂存在一个马口铁罐里。我父亲讨厌它的味道；我母亲说油脂润滑坦克，所以她刻意每天煎火腿。那是她为打胜仗所做的贡献。

我表哥弗雷迪的飞机在法国上空被击落。他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满是弹片，必须送回国住院。我的伊娃姨妈落下欢乐的眼泪。他儿子的腿感染了，而且全是洞，她却怪异地显得很高兴。他们取出77块金属碎片后，她把它们放进她的珠宝盒里的一个天鹅绒小匣子里，匣中还存放着亨利的勋章——优异飞行十字勋章



Photo courtesy of Merrill Joan Gerber



Photo courtesy of Merrill Joan Gerber

左侧是一张1943年拍摄的作者和亨利的弟弟弗雷迪的照片。右侧摄于1940年的照片中，最右边的是作者的父亲，他旁边是作者的表兄亨利·舍曼，即失踪的飞行员。

(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 和紫心勋章 (Purple Heart)。每当我们去布朗克斯看望她，她都让我拿着勋章，它们冰凉，棕色，硬棒棒的，要是你永远回不了家，它们似乎是意义不深的礼物。

战争持续这么久，人人都快疯了。我们每次上街购物，经过东4街(East Fourth)卡普太太 (Mrs. Carp) 的房子时，我们都停步思忖

她家前窗上的4颗金星。格雷塔姨妈总对我母亲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她怎么坚持活下去？”可随后我们还得干我们平常该干的事，走向面包房、肉铺和药店。

然而，突然间，战争出人意料地结束了。人们涌上街头，高声叫喊，向空中抛出五彩纸屑。陌生人把我举在半空并亲吻我。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么多的爱。我

感到骄傲，所有这种幸福跟我往银色锡纸球上裹锡纸的工作有某种关系。

1945年11月，一位邻居告诉我的格雷塔姨妈说，《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 登载了一篇文章。这篇题为《林德在香格里拉上空》(Lindy Over Shangri-La) 的文章报道了查尔斯·林德伯格<sup>2</sup> (Charles Lindbergh) 发现一些后来困在新几内亚的一个山顶上的被迫紧急降落的美

机。格雷塔姨妈立即写信，先是给报馆，然后按密歇根州底特律 (Detroit, Michigan) 福特汽车公司 (Ford Motor Company) 转交给她的地址给林德伯格去了信。她在信中说，如果他能做到的话，请他告诉她，由于某种好运气，她的外甥是那些迫降之一的幸存者。

她每天注视窗外，注意着邮递员的行踪，祈祷送电报的男孩永远不要停在我们街区的任何地方。她告诉我说，林德伯格是个勇敢的汉子和出名的飞行家，许久前也失去了一个儿子，一名凶手从幼儿床里偷走了他的男婴儿。她知道，如果信到了他那儿，他会回复的。她知道他会理解我们家庭的痛苦是什么滋味。

两周后信来了，我的姨妈就像打开一件贵重珠宝的包装一样撕开信封。她逐字念给我们听：

The Tompkins House

Long Lots Road

Westport, Conn.

December 4, 1945

Miss Greta Sorblum

405 Avenue "O" Brooklyn 30

New York, New York

亲爱的索尔布伦姆(Sorblum)女士：

在这封复信中，我不得不非

<sup>2</sup> 查尔斯·林德伯格：(1902 - 1974)，美国飞行员，因单独完成横越大西洋的不着陆飞行而闻名世界。林德伯格夫妇曾于1931年来华在洪水严重泛滥地区做飞行调查。(请详阅《交流》2000年第1期上《林德伯格夫妇协助中国抗洪》一文) 译注



Photo courtesy of Merrill Joan Gerber

使作者惊奇地发现她表兄的飞机残骸被找到的报纸文章。

常遗憾地告诉你，就像这些日子发表的类似报道一样，报纸上关于我在新几内亚看见数架飞机迫降在远离人世、交通隔绝的地方的报道并不属实。

你对被告知失踪的外甥非常担忧，我想让你知道，对此我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愿我能有对你有价值的消息。

查尔斯·林德伯格谨上。

40年后，我和我自己的孩子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 (California) 时，我有机会前往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滩 (Miami Beach, Florida)。伊娃姨妈那时住在科林斯大街 (Collins Avenue) 上一座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年久失修的退休旅馆的一间屋里，离海滩一个街区远。她已经失去丰满的身材，我小时候，她的身材使她显得高大，如今在我看来她的气质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消失了。

她在旅馆入口门廊等我。我们一进屋，她就非要把能想到可以送我的她的东西送给我：一块她一直想在烤面包片机里重新加热的存放多日的用锡纸包的法式吐司、放在电视机顶上的一个瓷制羊羔、一件镶着珠子的尼龙毛衣，她认为我穿上它去赴当天的正式晚宴会非常得体。她非要我吃一块大圆曲奇饼，那种我们孩子过去惯常称作“黑白饼”的甜饼干，这块饼干她一直留在她的



Photo courtesy of Merrill Joan Gerber

自飞机残骸中找到了作者的表兄、失踪的飞行员亨利·舍曼不离身的幸运银元。

小冰箱里。

她的丈夫和她的大儿子欧文早已去世。我的祖母和我父亲也已不在人世。她的儿子弗雷迪是一个成功的投资经纪人，住在3200公里远的地方。当我们谈到亨利时，她告诉我说他的最好的朋友已经娶了亨利的女朋友，有3个孩子。“所有人都走了。艾迪舅舅。欧文。山姆。我母亲和我父亲。就像是一场梦。”

“我总想事情那么蹊跷，山姆和亨利都失踪了，”我说道。“一家中的两个男孩。”

“山姆不是失踪。他是被杀害的。”

“他被杀害？我想他是在一次钓鱼意外中淹死的。”

“不是。山姆和他的朋友那天晚上没有钓鱼。他们沿海滩频繁走私朗姆酒，靠这个赚了一大笔

钱。山姆始终有进账快的眼光。对手有一条船抢他们的生意。他们互相开火。海岸警卫队介入了，谁知道怎么回事。两艘船都被击中，都沉了。没有一个人活下来。”

“奶奶总认为他仍然会回家。”

伊娃姨妈说：“人们都相信只能接受的想法。”

我离去前，我和姨母看了些旧照片，无意中看到亨利在他最后一次休假时把我举在他肩上的一张。那时我4岁，快5岁了，穿着一件毛衣和工装裤，戴着一顶带绒球的帽子。我的小手搂着亨利的颈背，他身着浆挺的制服，头戴帽檐上方有飞行员翼状标志的航空兵团军帽，他显得容光焕发。

伊娃姨妈说：“我要你保留亨利的东西——他从航校寄来的信、



Via [www.pacificwrecks.com](http://www.pacificwrecks.com)



Courtesy of Grant Malensek

左侧照片是本文中失踪的飞行员亨利·舍曼生前驾驶的“提前送递”(Early Delivery)号C-47型运输机。它是1943年1月在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杰克逊机场(Jackson Airdrome)拍摄的。右侧照片是格兰特·马连赛克(Grant Malensek)发现的该机残骸。头锥上“提前”(Early)一字仍可辨认出。

他寄给我的跟他所有飞机和他的哥们儿摆着姿势合影的像册、他失踪后他的指挥官来的信、施温森夫妇来的信。好好保管它们。告诉你的孩子们，让他们知道发生过的事。”

1989年，当时我享年92岁的伊娃姨妈过世刚一年多一点，我和丈夫边喝咖啡边浏览《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忽然报尾上的文章吸引了我的注意：

在丛林中死亡的飞行员46年后得以安葬

堪萨斯州莱文沃斯(Leaven-

worth) — 近半个世纪前，一名年轻的陆军飞行员告别他在威奇托的妻子和家人参加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星期五，罗伯特·施温森中尉的遗体被澳大利亚金矿勘探者在新几内亚一处浓密丛林中的山顶上发现一年后，终于长眠于此。施温森和在C-47运输机上其他4人在1943年2月他们的飞机被日本的战斗机击落后被列入“在行动中失踪”名单。施温森在乌云密布的星期五被安葬在莱文沃斯国家公墓(Ft. Leavenworth's National

Cemetery)，在场的有仪仗队并鸣枪致敬21响。罗伯特·施温森1942年秋留在身后的女人琼·罗克希尔(June Rockhill)说：“时隔多少个月，他最终回到了他归属的故乡。”她那时年仅18岁，新婚才3个月……华盛顿(Washington)的空军军官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么久才找到失踪飞行员的遗体，实属罕见。

“罗伯特·施温森！”我叫了出来。“啊，我的上帝！我得给我表哥弗雷迪去电话。”

弗雷迪立即和国防部取得联

系，并得悉在运输机驾驶舱左侧的驾驶员座位上还找到了亨利的遗骨。他的身份识别牌仍然挂在骨头上，他的皮带、刀子、眼镜框和他的幸运银元都在近处。除了罗伯特·施温森的遗体在驾驶舱的右侧，其他三名机组人员的遗骨在飞机后舱混杂在一起。政府未能找到任何失踪人员的家属，只是在发现飞机的消息登载在一家报纸上后，才有一位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施温森的亲戚要求提供更多的信息。最终施温森家才得以认领他们孩子的遗体。

弗雷迪第二天给我回电话时难以抑制他的眼泪，他告诉我说亨利将完全按军队的荣誉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政府将派人

给他送去亨利的幸运银元和几件经受岁月蹂躏而幸存的私人物品。弗雷迪说他感到高兴，因为他母亲活着时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知道他们找到了他，会置她于死地的。”

在搜索了许多电话号码并打了许多不见成效的电话后，我成功地找到了罗伯特的哥哥E.W. “斯韦德”·施温森 (E.W. "Swede" Schwensen) 的地址，并写信告诉他我们也找到我们家孩子的遗体了。他立即回信：我们这周刚从莱文沃斯堡国家公墓回来，在那里，罗伯特·H.施温森中尉与他的哥哥贾斯特斯·施温森上尉 (Justus Schwensen) ——一名在德国汉堡上空阵亡的B-24轰炸机驾驶员——隔着6个墓穴。我们家还失去了第三

个兄弟理查德·施温森 (Richard Schwensen) 步兵中尉，他在德国的雷马根桥战斗中阵亡，安葬在卢森堡的美国墓地。我们的双亲已经过世，但我的弟弟和我本人参加了罗伯特的葬礼……现在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这真不错，就此我们现在才得以继续我们的生活。

我自忖：一个三星家庭，他们是怎么承受的？

我没有参加亨利的葬礼，但是，有一天，我长大的女儿在车房里寻找一些她们幼时的玩具，翻出了一盒金纸星。我取出一颗星，粘压在我卧室的窗户角上——那是我对我遇到的最完美的士兵亨利小小的致意。◇

2000年，作者和她的表兄弗雷迪·舍曼瞻仰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中亨利·舍曼的墓。弗雷迪的哥哥亨利在战斗中失踪了40年左右之后坠落的飞机才最终被发现。

Photo courtesy of Merrill Joan Gerber

